

◀ (上接 13 版)

的动因,归结于圣人(尧、舜、益、禹、后稷、契、皋陶)的功绩。康有为作注称:

“草昧初开,为大鸟兽之世,及人类渐繁,犹日与禽兽争。今亚、非洲中央犹然,且大兽伤人尤多。今印度,岁死于虎狼者数万计,可知人兽相争之剧。中古人与人争地,故以灭国俘虏为大功。上古人与兽争,故以烈山泽、逐禽兽为大功。尧、舜之时,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,至周公时,尚以兼夷狄、驱猛兽为言。今则中原之地,猛兽绝迹,田猎无取,此后人道大强,兽类将灭。盖生存竞争之理,人智则灭兽,文明之国则并野蛮,优胜劣败,出自天然。而所以为功者,亦与时而推移。野蛮既全并于文明,则太平而大同矣。猛兽既全并于人类,惟牛、马、犬、羊、鸡、豕,豢养服御者存,则爱及众生矣。此仁民爱物之等乎?国之文明,全视教化。无教之国,即为野蛮。无教之人,近于禽兽。故先圣尤重教焉。五伦之立,据乱世之人道也。生我及我生者为父子,同生者为兄弟,合男女为夫妇,有首领服属为君臣,有交游知识为朋友,此并世相接之人天。然交合之道非强立者,圣人但因而教之。父子天性也,故立恩而益亲。兄弟天伦也,故顺秩而有序。男女不别,则父子不亲。太古男女随意好合,夫妇皆无定分,既乱人种,又难育繁人类,故特别正定为夫妇,以定种姓而传嗣续。若君臣无义,则国体不固,而不能合大群。朋友无信,则交道不行,而无以成群会。凡五伦之设,实为合群之良法也。而合群之后,乃益求进化,则自有太平大同之理。”

这是康有为著述中最接近于进化论的言词,故将之尽量引全。然若细细考察,不难发现,康有为所言“生存竞争”,实际上说的是“文明”战胜“野蛮”;“教化”、“五伦”是“先圣”所制,方能至于“合群”(即组织群体乃至于国家);进化的阶梯则由“乱世”而逐次走向“太平”、“大同”。这些与达尔文、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,仍有着明显的差异。

再来看《〈论语〉注》,完成于1902年4月。《论语·八佾》中有一段话:“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:大哉问!礼,与其奢也,宁俭。丧,与其易也,宁戚。”康有为在注释中大大加以发挥,其中宣称:

“……《公羊》称孔子为文王,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,非尚质退化者也……”

康直称孔子“文明进化之王”;若以此论,“进化”本是由孔子发明的。此后,康有为于1904年参观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,作《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》,称言:

“……知吾国教最文明、最精深,然后吾种贵;知吾国产有教主,道最中庸、最博大、最进化、最宜于今世,可大行于欧美全地,莫不尊崇,然后吾种贵;知吾国有最盛美之教,有神明圣王之教主,我全国及各教宜尊奉之,庶将来使大地效之拜之,如欧人之尊敬耶稣然,然后吾种贵。”

“监布烈住”,Cambridge,剑桥。“华文总教习”,汉学教授。“斋路士”,Herbert Allen Giles,1845—1935,翟理思(又译作翟理斯),是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。这个时候的康有为,已经周游各国,继续宣称孔子是“神明圣王之教主”,孔子学说是“最进化”、“可大行于欧美全地”。而英国恰是达尔文、赫胥黎的故乡。

我曾经仔细地考察康有为为此期102处“进化”的用法,突出的感受是,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“进化”一词,并对“竞争”有所保留。他可能通过间接读物而对“进化论”有了初步的认识,但对达尔文、赫胥黎、斯宾塞学说的精义,似为不太了解。也就是说,康有为从中国史籍与孔子著述中得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,与达尔文从自然观察中得出的物种进化规律,本属两途,也不能同归。“大同三世说”与源自西方的进化论,是两种外形有相似之处而学理并不相通的学说。据此,我以为,康有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并不是进化论所启迪、所催生的。

“暗合”:被推定的进化论者

根据以上的分析,我认为康有为不是进化论者;但学术界众多学者却推定康是进化论者,我以为,他们很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。

最早称康有为是进化论者的,是梁启超。1901年年底,梁在《清议报》发表《南海康先生传》,称言:

“先生之哲学,进化派哲学也。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,大抵皆取保守主义,以为文明世界,在于古时,日趋而日下,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,以为文明世界,在于他日,日进而日盛。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,以此为嚆矢焉。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,心得最多,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,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,其所传尧、舜文明事业,皆孔子所托以明义,愚一至善之鹄,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。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,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。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

力之所逼,亦不过停顿不进耳,更无复返其初。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,一治一乱,其说主于循环;《春秋》言据乱、升平、太平,其说主于进化。二义正相反对。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。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,而社会甚进化。政治不进化者,专政政体为之梗也;社会进化者,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。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,以为必有极乐世界于他日,而思想所极,遂行为大同学说。”

这一年,恰是康有为从槟榔屿转居大吉岭,遍注群经,撰写“大同三世说”的理论著作之时,梁启超却开始通过自学日语来系统地学习西学,写下了《霍布士学案》、《斯片挪莎学案》和《卢梭学案》。从后来的结局来看,梁启超撰《南海康先生传》,是对其师的告别,稍稍有点“谢本师”的意味。此后他在思想上与其师分道扬镳。在这篇仅用48小时、成文近两万字、以“Paint me as I am”(“勿失吾真相”)为目标的传记中,梁启超用刚学到的西学知识,将其师描写成无师自通的“西学”大家。除了“进化派哲学”外,梁还称康的哲学为“博爱派哲学”、“主乐派哲学”、“社会主义派哲学”。上面的引文,梁启超一口气用了9个“进化”,又用了“进步”、“退步”、“循环”等词,但可以明显的看出,这里面谈到的“进化”都是“进步”的意思,与达尔文、赫胥黎根据生物学所建立的“进化论”,没有太多的关系。也就在这篇文章中,梁启超又称:

“……虽然,所述者,则皆先生之言,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,附会缘饰之,以失其真也。此等理想,在今日之欧美,或不足为奇,而吾独怪乎先生未读一西书,而冥心孤往,独辟新境,其规模如此其宏远,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,不得不叉手赞叹曰:伟人哉,伟人哉!”梁称康“未读一西书”,以“冥心孤往”而达到了“博爱派哲学”、

“主乐派哲学”、“进化派哲学”、“社会主义派哲学”的境界,达到了与“今日之欧美”相同的境界。

1902年3月起,梁启超开始在《新民丛报》连载其重要著作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,至1904年12月,刊出该著的最后一篇,谈“最近世”之学术:

“……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,施根本的疗治也。三世之义立,则以进化之理,释经世之志,遍读群书,而无所于阙,而导入以向后之希望,现在之义务。夫三世之义,自何邵公以来,久暗焉,南海之倡此,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,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。”梁启超再次将“大同三世说”认定为“进化之理”,再次肯定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,由康独立“发明”的,没有受到严复《天演论》影响的本国产品。

1903年春,康有为离开印度大吉岭,开始其全球旅行。1904年来到英国,前面已提到他访问了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。这一年的秋天,康在英国伦敦参观了“生物史院”。(他在《英国游记》称“生物史院,英音曰呢虎希士拖利”,从发音和描述来看,应是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,即自然历史博物馆。该馆位于伦敦海德公园之南的克伦威尔路,是一处世界著名的博物馆。)康详细地记录了馆中的收藏、展示和他本人参观过程,面对达尔文、赫胥黎的石像,而对进化论发表了一番感叹:

“此院生物诡状异形,不可胜录,姑举其至异者,以资考识新理耳。入门即见达尔文、赫胥黎石像,为之欣悦,如见故人。赫君发天演之微言,达生创物化之新理。哲学既昌,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。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,此破落之所关,亦至巨哉。二生之说,在欧土为新发明,然鄙人

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,穷推物化,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,而人力抗天自为之,已与暗合,与门人多发之。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,惟我后起,既非剿袭,亦不相师。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,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。东海西海,心同理同,只有契合昭融而已。然子思曰:‘天之生物,必因其材而笃焉;栽者培之,倾者复之。’赫生天演之义也。庄子曰:‘程生马,马生人’;‘万物皆出于机,入于机。’达生物生人之说也。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。何异焉!”(《英国游记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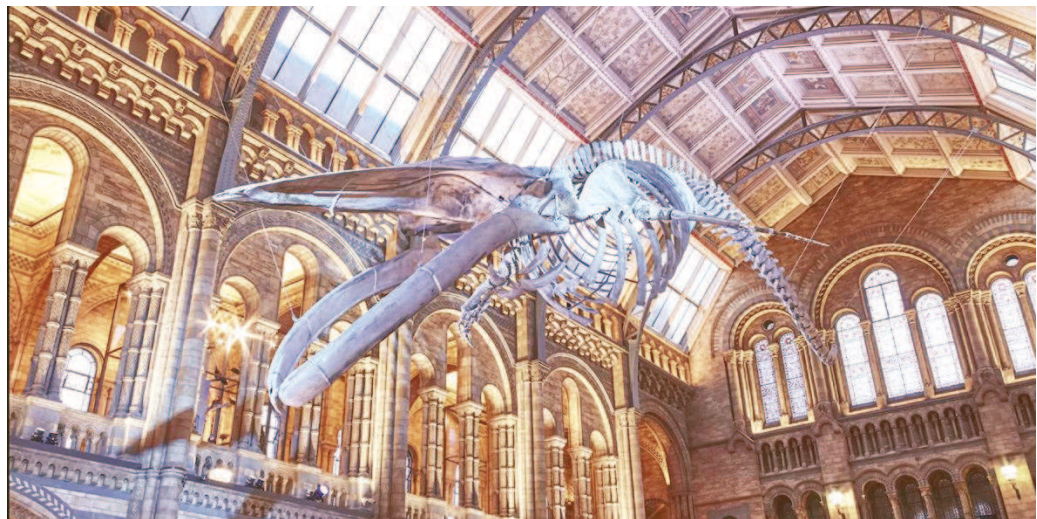
康明确提出:“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,穷推物化”,“已与暗合,与门人多发之”。此中的“门人”,包括梁启超,此中的“暗合”,与梁的说法相一致,“既非剿袭,亦不相师”。康进一步地指出,子思的“天之生物”,即是赫胥黎的“天演”之说;庄子的“程生马”,即是达尔文的“物生人”(人类起源)之说;中国的哲人领先西方三千年。

子思的“天之生物”,见于《礼记·中庸》,其文曰:

“子曰:舜其大孝也与!德为圣人,尊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;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。故大德,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,必因其材而笃焉,故栽者培之,倾者覆之。诗曰:‘嘉乐君子,宪宪令德,宜民宜人,受禄于天;保佑命之,自天申之。’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

《中庸篇》,郑玄认为是孔子之孙之思所著,故康有为称“子思曰”,尽管这段话一般认为是孔子所言。其大体意思是歌颂舜的德行。“必因其材而笃之,故栽者培之,倾者覆之”,一般解释为:“天”根据各物材质的美恶而施行有别,该栽培者加之于优育,该倾覆者则予以覆没。康在《〈中庸〉注》中将之称为:“物竞天择,优胜劣败。孔子发

(下转 15 版) ▶



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今貌,新展品蓝鲸骨架。康有为1904年来此参观后,感叹“此院生物诡状异形,不可胜录”。均资料图片